

巴金与人道主义

戴 翊

巴金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像一条红线,贯串在他的全部人格观念、思想感情和创作实践中,可以说,在现代中国作家之中,很少有像巴金那样表现出如此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直到在他晚年写下的《随想录》中,还许多次地提到人道主义,为在十年动乱期间,许多人“为什么变为兽?”又“怎样变为兽?”的问题而苦恼、而探索,也为“为什么有的人那样害怕人道主义”^①而困惑。

人道主义并不是一种严整的世界观,其内涵相当庞杂。对人道主义历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

并在 1929 年 11 月间,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版《评胡适反党义近著》一书。他们给胡适和新月派戴上“反党义”、“违反党义”、“诋毁党义”的帽子,攻击它“反对革命的哲学理论”、“反对革命的政法理论”、“是信著欧美民治主义的谬说”。……

罗隆基抨击“约法”的文章,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于是,对《新月》月刊及罗隆基本人再次进行打击。七月底,国民党北平市“整委会”和天津市“整委会”分别发生“公函”,声言取缔《新月》月刊。称“查新月月刊发行以来,时常披露反对本党言论。近于第八期中,竟载有诋毁约法、诋辱本党之文字,迹近反动,亟应严行取缔,以闭邪说,而正听闻。”接着,国民党当局便搜查新月书店北平分店,逮捕店员,没收千余份第八期《新月》月刊。……十一月四日,在上海吴淞公学逮捕了罗隆基,将他押送至伪上海市公安审讯,罪名是所谓“言论反动,侮辱总理”,“有共产的嫌疑”。^⑦

现在看来,有关国民党对“新月派”的迫害,事实上还远远地不止这些。而与此同时,站在国民党的反动立场,“新月派”也的确必须打击。因为从《新月》上所载的政论一类的文章来看,“新月派”对国民党的批判斗争不但是其中最为主要和响亮的旋律,而且还是其贯穿始终的普遍的内容。也就是说,《新月》上所载的政论文章,十九都是反对国民党的,并且上自国民党的“孙中山总理”和“蒋总司令”,下至其一般的“先进同志”,都一概受到了“新月派”的批判。因而“新月派”所受的打击,则完全是其“罪有应得”。

①见《新月》2卷1号《编辑后言》,1929年3月。

②③徐志摩:《“新月”的态度》,载《新月》创刊号,1928年3月。

④参看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载《创造月刊》第1卷12期,1928年7月)和冯乃超:《冷静的头脑》(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

⑤见鲁迅:《上海文艺一瞥》,载《文艺新闻》第20—21期,1931年7月—8月;现收入《二心集》。

⑥见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二)第24—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⑦见王金静:《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第321—33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9月版。

两种理解。狭义的人道主义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一种思想和文化运动；广义的人道主义则泛指一般主张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重视人的价值，要求人能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等等的思想和观点。^②应该说巴金的人道主义是包含着上述广义的和狭义的内容的。当他集中力量攻击和反对的对象是封建主义的时候，他运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理论家、艺术家的人道主义观念，即使是在文革期间、在被“专政”、被迫害的时候，他还在默默地背诵但丁的《神曲》，在《地狱篇》中汲取力量；而在一般现实生活中他表现出来的是人道主义思想感情，属一般的人道主义。

对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深沉的爱，是巴金人道主义的核心，也是他接受其他思想、并为争取实现其社会理想而斗争的基础。从幼年起，最先在他头脑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爱一切的生物，我讨好所有的人。我愿揩干每张脸上的眼泪；我希望看见幸福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嘴边。”^③他从自己的“第一个先生”母亲那里受到的虽是“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或富”、“要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奴婢，“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对他们动手乱打骂”的“泛爱论”的教育。“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拿出来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点事情，把我和这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好，这是我的全部性格的根底。”^④但他后来却没有完全照母亲的意愿做，他并没有“爱一切人”，他爱的是被封建家族制度摧残的年轻生命和那些忍受着奴役和压迫，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他感受到的生活现实同他受的“爱”的教育是直接抵触的。在他的那个表现上是平和富足的诗礼之家，实质是专制的黑暗王国，“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死亡；在狭小的马房里，他听那些瘦弱的轿夫们叙述那悲痛的经历，在寒冷的门房里，他听着衰老仆人绝望地伸述他们的胸怀。不止一个仆人由于犯了点过错，就被赶出大门，终于冻死在街头，有的甚至被诬陷“偷了东西”而不得不自尽。巴金深切地感到生活并没有爱一切人，没有爱那些受封建礼教戕害的年轻生命，没有爱他所亲近着的轿夫们。他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含着眼泪，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立志“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⑤他要自觉地去追寻一个平等的合乎人道的世界。这就是巴金的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他日后思想、人格的胚胎，也是他日后接受其他思想的内在基因，巴金日后接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这一点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人道主义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奉行的哲学。

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潮流使巴金的人道主义得到了升华。十五岁那年他接触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那篇无情揭露和愤怒控诉剥削阶级种种罪恶，号召青少年们起来“为人类求真理，求公道，求平等而不断的奋斗”，来建立光明合理社会的文章，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懂得了什么叫正义。他开始积极投入社会活动，用白话文写文章，上街散发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革命的传单。他热切地相信：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是他的坚强信念。反映在创作上，巴金通过《激流》等作品揭示了封建专制家庭内部那些被压迫、被奴役的善良人们的悲惨命运：善良美丽而又坚强不屈、以身殉情的鸣凤、被剥夺了纯洁的爱情，在孤寂愁苦中走向死亡的梅；温柔体贴、富于同情心的瑞珏；懦弱柔顺、哀苦无告、被专横暴戾的丈夫活活逼死的蕙；虽受到旧礼教熏染，仍不失其善良灵魂的觉新……这些值得同情的善良的人们，都是被万恶的封建礼教荼毒残害的，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此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同时，突出地表现了以觉慧为代表的年青一代的觉醒和反抗。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春雷闪电，惊醒和鼓舞了他们，他们思想中的最根本的觉悟就是“我是一个人！”“我要做一个！”这种悲愤的呼喊是黑暗王国囚徒们受到人道主义光辉照耀的必然反应。觉慧说“我要叫他（指高老太爷）知道我们是‘人’，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猪羊。”正因为专制家庭中他

们的意志不容许得到任何自由的表现和实现,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权利;所以要做“一个人”就成为他们在思想上觉醒的第一个内容和热烈追求的目标。他成了一个被大哥嘲笑的“人道主义者”。其实他内心虽同情那些“虽都是一样的人,一旦触怒了主人就不知道第二天怎样生活下去”的奴仆们,但已经很鄙薄对受苦人廉价同情的浅薄的“人道主义”,认为给穷人一点小施舍并不能改变他们受苦的命运,该诅咒的该叛逆的是不合理的现实生活。在觉慧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当年的身影。他日后接受的也是无政府主义中人道主义成份的美丽的理想,他曾说:“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派别”,而“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⑥巴金的无政府主要就是建立在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万人幸福的新世界。留法期间,被不公正、不人道、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折磨着的巴金很很自然地接受了卢梭“天赋人权”的思想。“人是生而自由的”,人生来又是平等的,这些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人道主义观念使巴金折服,在那些孤寂的夜晚,他多少次站在卢梭的铜象前体味着卢梭的思想,寻求人生的真理,直到六十年以后,他还尊卢梭为自己的“老师”。他狂热地投入了营救将被美国政府杀害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及其同志萨珂的活动,他读了凡宰地的《我的生活故事》一书,对作者那“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智慧都有机会发展”的思想产生强烈的共鸣。他自己也曾多次地用这几句话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凡宰地在被无辜处死之前,还表示宽恕别人,这也使巴金感动。但实际上,对于克鲁泡特金和凡宰地的“人类爱”观念,巴金同样不能全部接受。因为在巴金的感情世界中,存在着爱与憎的矛盾,他承认:“为了那恨,我曾侮辱了克鲁泡特金,因为我使人误解了他的学说”^⑦,而“为了爱我底‘先生’(指凡宰地),我反而不得不背弃了他所教给我的爱和宽恕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⑧《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表现出一种“恨人类”的特点,这多少也表现出作家的态度。这原因同样应该联系到上面讲的他的那个人道主义观念的核心上。对受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挚爱,使得他对中国的残酷现实、国民党反动派对大革命的疯狂反扑感到无限愤激乃至“绝望”。他通过《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之口就表示了对那个反动的社会制度和黑暗现实的强烈仇恨和挑战,并且响应地喊出:“凡是曾经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痛苦上面的人都因该灭亡!”同时他也借杜大心之口粉碎了爱的梦幻:“至少在这人掠夺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的,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对于那些吃草根,吃树皮,吃土块,吃小孩,以至于吃自己,而终于免不掉死得像蛆一样的人,我是不能爱的。”这是对群众的不觉悟感到痛心和失望。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巴金对人民群众当然是充满诚挚的爱的,但对于那麻木到了欣赏刽子手残杀革命者的人,他不能不感到失望,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爱的转化,是对受压迫的劳苦群众的深挚情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同样是巴金的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

巴金的人道主义决定他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倾向。他在主观上信奉无政府主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带有一定的偏见,但是在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国民党施行的白色恐怖的阶级压迫已经深重到广大人民无法忍受的地步的时候,作为人道主义者巴金必然会把他的全部同情倾注在人民一边,以及领导中国人民向着三座大山英勇斗争的革命政党一边,并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所以鲁迅曾经正确地指出:“巴金是一个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⑨他反对阶级调和和妥协行为,从未停止过同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蒋介石背叛革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残酷镇压人民,引起巴金的极大愤怒,他勇敢地站在同蒋介石反动政权和黑暗统治作斗争的前列,这同当时投靠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忠实走卒的一些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辉之流截然不同。特别可贵的是,他能够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写作了《理想是杀得死的吗?》、

《无政府主义并不同情国民党》、《空前绝后的妙文》和《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等一系列文章，对国民党的大屠杀提出强烈抗议，对遭到血腥屠杀，处于极端困难中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示真诚的同情和声援。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他愤怒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单靠刀枪的力量，纵然弄到伏尸万万人，流血万万步，也是没有用的。要是理想是可以杀得死的，那么今日堂哉皇哉做总司令做委员的诸公，这时仍会脱了裤子伏在那拖着猪尾的畜生的面前挨了板子还要高呼谢恩列！”^⑩而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共产党人表示由衷的敬意：“曾琦先生骂李大钊胆小，然而胆小的李大钊后来却以从容的态度，无畏的精神走上了绞台，为主义而死。在法庭上那样慷慨申辩，临死又如此勇敢，在主义上他虽是我的敌人，在行为上，我对于他却极为佩服。我确定恭敬他像一个近代伟大的殉道者。”^⑪巴金并不赞成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行动，他明确表示反对杜大心“采取这条路”。在《电》里，作者也通过李佩珠之口对敏等人的冒险行为表明了否定态度：“我们没有理由轻易牺牲。血固然很可贵，可是有时候也会蒙住人的眼睛。痛快地将出生命，那是英雄的事业。我们似乎更需要平凡的人。”但另一方面，巴金又充满热情地宣称：“但是我爱他”（指杜大心），爱他那种反抗暴政，热爱人民，勇于牺牲的精神。巴金不但让自己的这些人物充当殉道者，而且每每用赞颂的口吻描写他们的殉道行为。由于认为他们的牺牲具有唤醒人民的作用，他“对‘恐怖主义者’也极佩服”。这里鲜明不过地显示了巴金的人道主义在他对无政府主义主张的取舍上所起的作用。

巴金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著作，特别是从马拉等革命家的思想的朴实热烈，充满牺牲精神的境界中汲取到很大的鼓舞和力量。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坚决地反对封建制度，并向着封建制度无情攻击的精神和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想给他以面对现实的力量。在他看来，马拉“比当时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更爱人民”，这与他内心深处对人民的情感发生深刻的共鸣，他引用前人对马拉的历史评价：马拉，一个“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法国自由的忠实的看守者”，“下层阶级的朋友，被压迫阶级的忠实战士”……把马拉作为他“心灵生活中的一个指导和支持”。正是这些精神力量支持着他开始用文学的武器同中国的黑暗现实作斗争。

巴金曾表示：“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他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⑫始终把矛头指向封建制度和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者。从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就塑造了杜大心这个誓与黑暗社会制度誓不两立的人物形象，揭露和抨击了“各地连年战争，军阀鱼肉人民，流氓土匪横行，外国人在中国大地上作威作福，以及革命人被屠杀等等”人压迫人、人吃人的黑暗现实，表现对平等和幸福的向往。《激流》、《死去的太阳》、《雪》、《砂丁》、《火》、《第四病室》、《寒夜》等作品，向封建制度、封建道德观念和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的黑暗社会作斗争，反映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努力揭示造成这些苦难的根源是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这些作品中表现的人道主义同巴金的理论观念是统一的，就是呼吁彻底反抗，“除了反抗而外，再没有别的方法使人类解放”。值得注意的是，《萌芽》、《寒夜》等作品不是把封建大家庭和帝国主义作为攻击目标，而是通过工人和知识分子遭受到的残酷压迫和非人的生活，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灭亡》通过鬼魂呼出了“我们在贫穷里生，我们在贫穷里受苦，我们在贫穷里死。这都是为着你们”，已经揭示出统治者与下层群众的阶级对立。《萌芽》则不但揭示了工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严重阶级对立和工人群众的朦胧的阶级觉悟，甚至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唯一出路就是在革命政党领导下建立自己的组织，团结起来开展暴力斗争这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寒夜》是巴金在建国以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通过抗战时期重庆某图书文具公司小职员汪文宣一家的不幸遭遇，真实地展现了那个时代在国民党反动派统

治下的大后方,千百万人民群众被驱赶到苦难深渊而绝望挣扎的时代悲剧。这是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锋芒最集中的作品。《寒夜》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控拆,不仅在于真实地再现人们生活上受到压迫,作者还进一步揭露黑暗现实践踏人的尊严,扭曲人性,造成人们心灵深处的重重矛盾,在生活中进退失据,不自觉地大踏步奔向毁灭。作者无情地撕下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表皮,给人们看到了那一幅老百姓被推入苦难深渊而挣扎呼号的令人战栗的残酷图景。

这里,作者的人道主义与他的政治倾向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当然,也要看到,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也使巴金有时候不能彻底地分清善恶,反而不适当地对某些不值得同情的现象表示同情和怜悯,进而把这种现象也写成“悲剧”。例如1944年写成的中篇小说《憩园》,就是以—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荒唐堕落到不可救药地步的破落地主杨老三作“悲剧”的主人公。作品通过这个败落的纨绔子弟败光了家产仍不思悔改,被赶出家门,只好去乞讨、偷窃,遭到毒打、监禁,罚作苦役,最后病死的“悲剧”,竭力渲染其“失悔”和可怜相,让作品中的“我”和一些主要人物对他表示由衷的同情和关怀,主张“宽恕”第一,并指责别人对杨老三不人道。其实,正如黑格尔所说:“内在的丑在它的客观存在中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美”^⑬,因而杨老三的“悲剧”根本不可能引起读者的同情,而只能引起憎恶和反感。杨老三的原型是巴金的一个叔叔。在《激流》中,作者曾怀着极端的憎恶,以他为模特儿创造了克定这个地主阶级败家子的典型。可是在写《憩园》时,作者对他的态度却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由憎恶变在了同情,把这个毫无正面素质的人物也写成了“悲剧人物”。与《憩园》相似的,还有以—个流落在中国的白俄分子作为“悲剧”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将军》,对他同样抱有不适当的同情。这些例子说明,世界观的局限,也影响了巴金小说在悲剧创造上的成就。

经受过文革动乱的巴金对—人道主义的思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更深刻的层次。文革期间亲眼见到“兽性的大发作”,无数人被吞噬的鲜血淋漓的事例和亲身受到的野兽般的凶残迫害,使他不能不深深地思索—这个问题,在晚年撰写的《随想录》中,他多少次地提起—这个问题,甚至还以“人道主义”为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收在《随想录·无题集》里)。他思索的是“这兽道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他要“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他终于明白,产生那大量非人道的残酷行为的就是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热,而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了。所以“时机一到,一声号令,—霎时满街都是‘虎狼’,哪里还有人敢讲人道主义?哪里还肯让人讲人道主义?”总之,关键是必须把人兽转化的道路堵死。可是有人却那样害怕提人道主义,这实在使巴金感到困惑。然而他不害怕这些人的横眉怒目,他一如既往地探索着、寻求着……

①巴金:《随想录——四(我的噩梦)》。

②参见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巴金:《我的幼年》。

④巴金:《我的几个先生》。

⑤巴金:《我的幼年》。

⑥巴金:《谈(灭亡)》。

⑦巴金:《新年试笔》。

⑧巴金:《(灭亡)序》。

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⑩巴金:《理想是杀得死的吗?》。

⑪巴金:《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

⑫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

⑬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278页。